



目 录

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代序）	胡绳武（1）
----------------------	--------

辛亥风云

辛亥革命在枣庄	辛亥革命史料组（20）
峰县辛亥革命片断	（28）
台儿庄辛亥革命纪略	（35）
反清倒袁的革命志士尤民	（42）
峰县辛亥革命时的情景	（67）
保皇派王宝田	（70）
附：王宝田镇压辛亥革命部分奏摺摘抄	（82）

辛亥人物

尤民与江阴独立	（94）
缅怀家父孔繁霭	（104）
忆先父张文源	（113）
反清志士吴廷勋	（119）
张锦湖先生事略	（126）

2036/38

赵常增先生事略.....	(131)
渠有润先生事略.....	(136)
吴绍麟先生事略.....	(138)
尤吉三先生事略.....	(139)
颜兰亭先生事略.....	(141)
李天倪先生事略.....	(144)
武璋先生事略.....	(146)
枣庄地区同盟会员名录.....	(148)

辛亥前后

驰骋鲁南的幅军.....	(152)
清末民众反洋教斗争纪略.....	(165)
清末民初官逼民反事件.....	(169)
清末崛起的中兴公司.....	(175)
“五四”运动时的李庆施	(184)
“五四”运动时的李慎五	(196)
“五四”新文坛上的王思玷	(199)
民初时的滕县女子小学.....	(209)
附录：编辑出版《枣庄人物集萃》方案.....	(212)

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代序）

胡绳武

历史上有些伟大的事件好象一块一块的路碑，记载着社会发展的里程，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推翻清朝政府的辛亥革命，就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块伟大的里程碑。

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

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反动统治长期郁积的愤怒的大爆发。它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这次革命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以挽救民族的危亡，争取国家独立富强为出发点和首要问题的。辛亥革命的这个特点来自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特点，中国近代的民族灾难实在太深重了。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扑向中国，对中国恣意地进行蹂躏、奴役和掠夺。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了中国的政治，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中华民族在世界上遭人贱视。这一切，不能不使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感到极大的痛苦。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恶化

了。从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到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这10年是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年代，也是辛亥革命从酝酿走向高潮的年代。在这10年当中中国接连遭受四次打击，而每次打击都是相当严重的。1894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军队惨败，清朝政府同日本签订了割让台湾省、赔款二万万两的《马关条约》；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出现了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一时瓜分中国的叫嚷甚嚣尘上；1899—1900年，义和团奋起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最后在八国联军和清朝政府联合攻击下遭到失败，清朝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904—1905年，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控制中国的东三省，竟在中国的领导土上进行了一场恶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一切，怎能不使每一个爱国者感到极大的痛苦？怎能不激起中国人民为挽救祖国的危亡而进行顽强的斗争？1901年邹容愤笔书写了他人在《清议报》上发表的《有感》一诗：“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原诗载《清议报》第81册，1904年宋教仁写的一首长歌中有这样几句：“嗟神州之义沧兮，尽荆天与地棘；展支那国以大索兮，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披发长啸而四顾兮，怅怅乎如何逝。”（《采教仁集》下册，第500页）这类诗句确实表达了亡国灭种的威胁，象一个可怕的阴影，时刻笼罩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在如此严重民族危机的形势下，统治着中国的清朝政府，不仅是封建势力的顽

固堡垒，并且已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成了“洋人的朝廷”。煌煌上谕中公然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它从一切方面忠实地执行帝国主义的意旨，竭力向帝国主义分子讨好。清朝政府的各级地方官员也无不兢兢业业地一意媚外，竭力维护外人在华的侵略权益。“内而宫廷，外而疆夷，下至微员末秩，皆莫不以敬礼外人为宗旨。”（《新民丛报》，第二十号，页110）辛亥革命就是在这么一个历史背景之下发生的。它集中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的反对卖国的清朝政府，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疯狂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强烈愿望。

可是，当广大的爱国者开始强烈地意识到“救亡”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已落后于西方几百年。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深入，虽开始有所变化，但环顾中国辽阔的国土，旧的社会结构、社会力量和意识形态仍然占着支配的地位。内地许多省份，状况同几百年前几乎没多大区别。生产主要还是靠分散的一家一户的小农和家庭手工业的集合体进行着。经济和文化落后。地主豪绅控制着一切权力，到处充满着令人窒息的黑暗的旧势力。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历史重担。

中国要奋起，单单一股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和勇气是远远不够的。时代已经变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内部旧有的那些社会力量已经不能给中国指明新的出路，把祖国从危亡中拯救出来。

地主阶级改革派，在鸦片战争以及以后的一些年代中，曾经在反抗外来侵略者、唤起人们睁开眼睛研究世界等方面起过重要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前进，他们已越来越难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逐渐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声匿迹了。广大农民群众虽演出过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给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但农民究竟是分散的小生产者，他们不可能制定明确的革命纲领，并用这个纲领来团结所有的革命群众；他们不可能长期地维持革命的纪律和领导层的团结，以使集中自己的力量战胜强大的敌人；他们缺乏用科学的方法总结革命经验，并用这些经验来指导革命实践的能力。因此，太平天国虽然比过去一切农民战争有着更完整的进步的纲领制度，并且前后坚持了十四年，势力扩及十七省，最后仍不免悲惨地失败了。以农民、城市贫民和游民为主体，也有一些爱国的中小地主参加的义和团运动，虽然沉重地打击并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企图，但却存在着严重的弱点和愚昧落后的东西，最后不免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联合武装进攻和清朝政府的叛卖下失败了。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及失败表明：尽管在广大农民群众中存在着巨大的反帝反封建的力量，但它却不能给中国指明新的出路，开创出新的历史局面，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

历史需要有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角，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渐渐解体，新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们在悄悄地成长着，

但它们的力量一时仍很微弱。中国早期的无产阶级当时还只是被人贱视的“苦力”，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新兴的资产阶级在甲午战后虽然用远远超过以往的规模和速度发展起来，但面对着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他们的力量是微弱的。他们大多数从地主阶级转化而来，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身上有着浓厚的封建性。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使他们具有明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可能象法国资产阶级那样，挺身而出，扮演革命英雄的角色。他们害怕革命的发生，引起社会的动乱，导致帝国主义列强的出面干涉。他们中的多数人在政治上倾向于立宪派，幻想通过要求清朝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实行政治民主、发展经济来达到国家独立富强的目的。

但是，十九世纪末年和二十世纪初年，民族的生死存亡已处于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客观局势的紧迫性决定着必须有一种力量站出来扮演改变现状的主要角色，即使条件远没有成熟，也只得如此。于是，呱呱落地不久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尽管先天不足，却身不由己地被推到时代的前列，充当了先锋的队的角色。这种看来颇为奇突的现象，是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

这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大体上是在甲午战争以后才形成的。

在这以前，虽然也有一些到过国外留学、接受了近代教育的留学生，也有过一些在国内受到西方近代文化

影响的士大夫，但他们不仅人数太少，而且往往被淹没在强大旧势力的包围中，逐渐变得无声无息。即使出来呐喊几声，在社会所引起的反映也十分有限。

甲午战后，特别到了十二世纪初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的强烈刺激，随着国内资本主义初步发展带来的新的社会需要，进入二十世纪后，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个是出国留学生的大量增加，一个是国内新式学堂的陆续兴办，通过这些途径培养出来的，是不同于旧式士大夫的近代知识分子。到辛亥革命前夜，全国已有近两万上下的留学生和两百万左右的新式学堂的学生（陈翊林：《最近三十年教育史》第167页）。

这些留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在当时看来是一些“新派”的人。在他们身上，有几个突出的优点：第一，对世界大势、列强的对外侵略扩张和中国所处的地位有比较多的了解，对中华民族面临的深重民族危机有比较敏锐的感受，从而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第二，他们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文化思想，开始形成一种新的理想，新的衡量是非的尺度。他们面前有了一种憧憬和追求新的奋斗目标；建设一个近代化的工业社会和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这是旧式士大夫从来没有梦想过的一种解决中国问题的全新的社会方案。第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文化观念，对他们有着深刻的影响。他们比较年青，因而在接受一种理想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后，能够奋身不顾地为之奋斗。他

们当中许多人的家庭由于社会经济危机正在败落，自身也感到前途茫茫，从而使他们有一种急于改变现状，要求反抗的强烈的愤懑情绪。华盛顿、拿破仑、马志尼、加里波的等人的榜样，又给他们很大的鼓舞。所有这些，导致他们怀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而且充满着自信。

正是这些人成为辛亥革命前后站在斗争前列的最先觉悟者，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重要活动分子，绝大多数是从他们当中产生出来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便是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

他们在周围几乎一片黑暗的环境中，勇敢地高举起民族民主革命的火炬。他们在海内外创办了许多刊物，后来又出版报纸，并在群众中进行了一些比较有效的宣传鼓动工作。他们大声呐喊，呼吁人们奋起推翻腐朽卖国的清朝政府，在中国建立起民主共和的制度。他们断言，只要这个目标能够实现，中国就将踏上一条光明的坦途。这在几乎绝望的中国人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的火苗。

但他们本身的社会基础是十分落后的。“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是中国的一句老话。究竟要依靠什么力量才能实现他们的主张？下层的劳动群众似乎还在沉睡中，或者只能做一些无望的分散的反抗，那时还远远在他们的视线之外。海外的爱国华侨可以给他们一些资助，但很少能回国直接参加革命活动。祖国的危急，促使他们急于在中国社会中寻找出一些现成的有组织的力量，作为实现他们目标的手段。他们最初依靠的力量是会党，后

来又到新军中去工作。会党也好，新军也好，都有自己的特点。会党主要的成份是游民，它的消极方面表现的更为突出，但在当时是能够对旧的社会秩序发起冲击的重要力量。他们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虽然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革命的观点深入人心。

腐朽卖国的清朝政府实在太不得人心了。亡国灭种的威胁和苦难的现实生活，激怒了一向看起来那样温顺的人群。人们在经历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年一系列惨痛事实的教训后，终于对这个政权失去最后一点信任，再也不抱任何希望。到处都是愤怒和诅咒。变更要求弥漫举国上下。清朝政权的最高统治集团变得对谁都不敢信任了，一概采取排斥的态度。结果，连许多汉族官僚和立宪派对它也离心离德，使它日益成为孤立无援的孤家寡人。

清朝政府在表面上还是个庞然大物，骨子里已完全空虚不堪一击了。客观的历史进程已达到这样的地步：只要能有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即使本身还远不成熟的力量）挺身而出，首举义旗，登高一呼，并站住脚跟，就能将各种不满和要求反抗的潜在力量凝在一起，而那个腐朽的旧政权就会象纸糊的房子那样很快倾覆下来。

这便是我们在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和随后各省起义中所看到的情况。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

辛亥革命的胜利，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飞跃。它的直接结果是：不仅推翻了统治中国达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政府，而且结束了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

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遭受剥削压迫、贫困苦难的根源，它严重地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到了近代则大大便利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奴役。彻底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极端贫困和落后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前提。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决不能因为辛亥革命虽赶走了皇帝，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依然如故，就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的变化，而低估了它的伟大历史意义。亲身经历过这次革命的林伯渠在半个世纪前曾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低估的，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0日）林伯渠是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就入会的老会员。他这段话，确是深有体会的中肯之言。

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如果从秦始皇算起，到辛亥革命也有二千一百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沉重得可

怕的因袭重担，以这种制度为核心，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整套渗透到各处的统治网络，成为中国社会内部整个封建统治秩序赖以生存的重要支柱。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人们从幼年时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巅的最高代表，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直到十九世纪末年，这种“民不可一日无君”的思想，还在统治着人们的头脑。康有为等人领导维新变法运动，介绍了不少西方的社会学说和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但他们却不敢否定君主存在的必要性。康有为的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泽厚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一类的话，正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破天荒地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提出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这是多么难能可贵！

辛亥革命果真把历来奉着神明的君主专制政体一举推倒，把它彻底废除。《临时约法》明确宣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普通老百姓从历来的“子民”、“官民”、“蚁民”一下子变成国家的主人，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变化。它在整个社会生活和人们头脑中所引起的巨大震动是可想而知的。

它带来的后果至少有两条：

第一，使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封建统治秩序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封建统治就乱了套。这以后，从北洋军阀到南京政府就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不用说人民革命的浪潮始终一浪接着一浪，就是反动阵营内部也无法再保持统一。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清朝政府这时又已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驯顺工具，推倒它，又是对帝国主义的一次打击。这样，这次革命就为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的解放。皇帝该算是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打倒、取消，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文章说：“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重他，才能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陈独秀：《偶像破坏论》、《新青年》5卷2号）辛亥革命在中国人民中还造成民主精神的普遍高涨。人们的思想认识提高了是不

会再退回去的。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起来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国出路了，再加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和中国工人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了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

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这个临时政府的大总统府设在原来的两江总督衙门，也就是太平天国天王府旧址。从太平天国到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相距半个世纪。从单纯的农民战争，到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这标志着中国的历史向前大大地跨进了一步。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采取一系列革新措施，其中包括：改用阳历；限期剪去辫发；劝禁妇女缠足；禁止在审理民刑事件时使用肉刑；禁止买卖人口和贩卖“猪仔”，改变“贱民”身份，严禁鸦片；废止“大人、老爷”等称呼，官厅人员以官职相称，民间相呼为“先生”或“君”；废止跪拜，改成鞠躬礼；提倡廉洁奉公等。这些措施，对移风易俗起着重要的作用，使人耳目为之一新。

临时政府还提倡振兴实业，保护私产，制订并颁行一系列保护和促进农工商业发展的章程、则例；实行教育改革，将学堂改称学校，规定各级学校的暂行课程，废止小学的读经课，对报纸实行言论开放政策，这些无不具有积极意义。

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只存在三个月，它的各种政策措施甚至在南方各省也难以得到认真的贯彻，但不能把它看作只具有象征的意义。民主共和制的建立给人们燃起了新的希望，使他们受到很大的鼓舞。民主精神普遍高涨，使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南方各省，社会政治生活变得空前活跃，各种政治团体、报刊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振兴实业”的口号下，出现了兴办近代实业的热潮；社会风尚在短时期内除旧布新，出现了新风。尽管南京政府很快就结束了，但历史已不能倒转，已经发生的这一切变化谁也无法把它抹杀掉了。

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实在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灭它，决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诚然没有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但它在探求中国之所以落后和遭受侵略的原因，力图找出救亡图存使祖国富强方案的过程中，认识中的合理部分，无疑有助于提高当时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有助于后来人们对中国革命问题取得科学的认识，辛亥革命时期那么多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地为革命不惜赴汤蹈火，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并且结出了硕果。这些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驱者，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辛亥革命的深刻教训

辛亥革命无疑也有它的重要弱点。它是中华民族在

生死存亡关键时刻奋起的殊死搏斗，卖国的清朝政府，已经腐朽到了极点，因而这场革命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这是它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但革命的全体力量本身是先天不足的。

站在辛亥革命前面大声呐喊并发起冲锋的，是一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国内真正能够依靠的社会基础十分薄弱，而他们面对的旧的社会势力却十分强大。那些受帝国主义或明或暗支持的买办和地方豪绅在中国社会中盘根错节，有着根深蒂固的支配力量。革命暴风雨的猛烈冲刷，能够比较快地摧毁的还是它的表层。更深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心态并不曾有一个根本的变动。推翻清朝政府、结束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个有限的目标实现了，但要巩固并发展这种胜利却困难重重。

从今天看来，辛亥革命自武昌起义到二次革命失败这段历史的客观进程，已清楚地表明：要想从根本上摧毁那些盘根错节的旧势力，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新社会，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完成民族民主的革命任务，需要几个条件：第一，需要有一个能够正确地把握前进航向的坚强有力的革命党，作为革命的引路人，作为团结广大群众万众一心地进行斗争的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即使客观上存在着比较成熟的革命形势，并且付出了重大代价，但革命的队伍仍然是涣散无力的，难以实现既定的目标，甚至误入歧途。第二，需要以革命派为主体，区别各种复杂情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